



高桂滋公馆小楼。

建国路83号：历久弥新的文学地标

从古都西安钟楼出发,东行1.8公里,入建国路南行约160米,坐东朝西,一座掩映在新老交替、高低参差的楼房群中的独小院映入眼。小院北牵建国二巷,南挽建国三巷,两层高门楼顶端像极了一部厚重的经典巨著。

两侧门柱上悬挂着一副红底黑字的隶书楹联,上联曰:“深入生活,筑高原,攀高峰,建功新时代。”下联曰:“扎根人民,推新人,出新作,奋进新征程。”书香气息扑面而来。这里便是位于西安市碑林区建国路83号的陕西省作家协会。

在陕西省作协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领略其独特的风采。

建国路83号,至今保留着高桂滋公馆的称谓。高桂滋(1891—1959年),字培五,陕西定边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等职。高桂滋公馆建于1933年,与南邻张学良公馆中间夹着一道称作金家巷(后更名建国三巷)的丁字小巷,占地10余亩,是一栋中西合璧、以西为主的二层小楼,与三座四合院相通相连的建筑群,以兼顾全家老少数十口人各不相同的审美爱好。公馆建成后,由于战事不断,主人戎马倥偬,终究未能居住。新中国成立后,高桂滋将这座别具一格的建筑无偿交给人民政府。

1953年10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更名中国作家协会,原各大区作家协会均改为大区所在城市的中国作协分会。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筹委会经过综合考虑,最终选定闹中取静、深宅大院的高桂滋公馆作为会址。

高桂滋公馆大门西开,面临建国路。大门两侧是门房、车库以及司机、副官的住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对大门,前院正中的一个直径约16米的圆形喷水池,莲花状喷头高约2米,池中“鱼可百许头”,池周有栏杆、小桥。池北约20米,是一座占地287平方米,由混凝土立柱和砖木混合建造的两层小楼:一楼为半地下建构,主要用作储藏室,置有小型燃煤水暖锅炉,水被烧热后,用人力升压,把热水送到楼上的散热器中,这就是当时的暖气;二楼门前10级台阶,拾级而上,是宽1.6米、长10米的廊檐。廊檐之上,三扇门呈“品”状开放,中为进入小楼大厅的正门,西为会客厅偏门,东为主卧室门。进入大厅,左边是会客厅,会客厅内有餐厅。大厅后排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客房,又称东西耳房。院内从前到后栽植着玉兰、紫薇、石榴、月季、玫瑰等名贵花木和桃梨果木。沿小路向东,经过一座以成排玫瑰和高架葡萄为主的大花园,穿过一个圆形小门,三座四合院就呈现在眼前。据工作人员介绍,小楼所在的院子被称为大院子,而三座四合院的小院则称作偏院。四合院从东到西,坐南向北,大门均开在启新巷(后更名建国二巷),院落之间既有通道联系,又相互独立。四合院的平房全是砖木结构,院中青砖铺地,院中央栽着海棠树。四合院中南房为上房,建在约0.5米的高台上,呈“凹”字形,一进两开,中间为起居客厅,外边有走廊,东西两侧各为卧室。东、西房为厢房,可以居住,亦可作为餐厅和客房。北房虽没有上房那样宽阔的廊檐,但阳光充裕,比上房更加温暖。

如上,大致是高桂滋公馆建成时的原貌。四合院东侧是解放后收购来的几处居民院落,建筑不一,高矮不同,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馆使用面积。此地原为西北妇女联合会办公地,因其撤销,交由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和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共同使用。至1963年后者撤销,全院归前者独立使用。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由于业务不断拓展和人员陆续增多,从实用角度出发,高桂滋公馆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改动,只保留下前院小楼和圆形喷水池的原貌。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小楼西南角紫荆树下,醒目地竖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82年2月23日公布、陕西省人民政府1985年12月12日设立的“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事变旧址——高桂滋公馆”字样的方形石碑,吸引不少游客,特别是文学爱好者竞相参观合影。

随着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54年11月8日隆重召开,标志着陕西文学工作者正式在时为建国路7号、之后先后改为建国路71号、83号的高桂滋公馆“安家落户”了!

作为礼堂的前院小楼,专门用以举办重要文学会议和对外交流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日本、印度尼西亚作家代表团就前来访问过;20世纪80年代,苏联、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日本、意大利、德国、泰国、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也陆续前来访问;20世纪90年代,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代表团抵达访问;2000年以来,摩洛哥、塞尔维亚、叙利亚作家代表团也纷纷来这里访问。可以说,这栋前院小楼见证了陕西当代文学发展繁荣和对话世界文坛的每一个弥足珍贵的足迹。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陈忠实曾与这

里有过长达12年朝夕相处的经历,其在《办公室的故事》文中写到——

一九九五年初夏,西安阴雨连绵。我早晨上班走到那间顶多十平方米的平房前,围着几个后勤办公室的干部,说我的这幢房子下沉了。我顺着他们手指的墙壁一看,砖墙齐刷刷断裂开一道口子,可以塞进拳头。他们告诉我绝不能再住了,却没有别的房子调换,让我等待,说是前院一间房子正在翻修,需十天左右弄好。我便趁此无立足之地,住进医院,去做医生早就催着要割除的一个粉瘤。待我康复回归,后勤办的干部领我走到前院一座独楼前,指着东边的耳房,说这就是我的新办公室……

作为办公区,后院三座四合院从东到西分别为1、2、3号院。1、2号院用于机关办公和专业作家创作;3号院属《延河》编辑部,后来又创刊《小说评论》。在这个几乎所有人提起笔能写、拿起稿能编的大家庭里,行政干部、专业作家、杂志编辑的角色随时可以互换,一身兼多职者十分普遍,例如:胡采既是作协党组书记、主席,又是作家、评论家,还是《延河》《小说评论》主编;王汶石是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又是驻会专业作家;路遥既是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又是《延河》小说组组长和驻会专业作家;陈忠实既是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主席,又是驻会专业作家、《延河》主编……如此,三座四合院便成了坊间戏说的“大杂院”。

或许正是由于其“大”且“杂”,开门办协会,开门办期刊,接地气,通清气,才成为全省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集聚地,有慕名拜访的,有求教指点的,有投送稿件的,有畅谈交流的,时常因一个不同的文学观点而争得脸红脖子粗。但回过头,又是心贴心、手拉手以至恨不得“两肋插刀”的好朋友。作家之“家”嘛,进入这里就算回到“家”啦,客气个啥?

而建国路83号给予中国文坛最大的影响和给予文学陕军最大的鼓舞,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导向,其中:柳青定居长安皇甫村14年,推出长篇巨著《创业史》等;王汶石多次深入渭南、咸阳农村体验生活,推出中短篇小说《风雪之夜》《沙滩上》《黑风》等影响深远的艺术精品。陈忠实在其《为了十九岁的崇拜》一文中,无限深情地记述了读高二年级时,与爱好文学的两名同学从新出刊《人民文学》上初读《沙滩上》的情景:“三个人几乎是接力式地迫不及待地阅读了,相约着走出学校后门和后门外的操场,翻过渭水长堤和柳树林带,在渭水这边的沙滩上围坐下去,讨论起《沙滩上》来了。这样的讨论连续有三四次,都是在晚饭后自由活动时间里进行的,每一次都持续到熄灯就寝的钟点……”(见《人民文学》2000年第2期);杜鹏程深入宝成铁路工地,推出中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夜走灵官峡》等系列佳作;李若冰扎根柴达木石油勘探队、四川盆地石油勘探工地,推出《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等系列佳作……改革开放后,在中国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里,分别代表陕北、关中、陕南创作阵营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驾马车”时代,更是以文学为生命,或与一线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或以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思考于斯的厚土为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或立足时代大变革之风口浪尖,板凳坐得十年冷,我手写我心,我心向天问……如此,由建国路83号蔓延而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人民而歌”之创作风气蔚然形成,文学“陕军东征”之风历久弥新。

在这里,铸就下老中青陕西文学人,以会作家,废寝忘食,挥汗如雨,深耕文学沃土的身影;在这里,路遥以超常的勤奋、毅力与才华,多年如一日,“早晨从中午开始”,创作出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人生》、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用年仅42岁的生命兑现了“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追求;在这里,陈忠实以厚积薄发的力量,创作出《初夏》《十八岁的哥哥》《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等精品佳作,尤以垫棺作枕的长篇巨著《白鹿原》辉映文坛,诠释了“文学依然神圣”的信仰。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陕西文化大省、文学强省建设的神圣职责使然,建国路83号焕发蓬勃生机,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前后院之间废弃的库房原址上拔地而起一栋南北宽约15米,东西长约54米的3层楼房,名曰“创作之家”。后因四合院年久失修老旧下沉之故,作协机关和所属事业单位整体迁入“创作之家”,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干部职工的工作、学习环境。其中,一层最东侧的陕西文学陈列室,清晰地展示了陕西文学的发展脉络,尤其生动翔实地介绍了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陕西省作家协会70年一路走来创业的艰辛,观之,令人唏嘘慨叹。难怪2018年3月,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来陕调研时,高度肯定陕西文学在全国的重要地位,特别指出:“陕西不仅是文学大省,更是文学强省,从某种程度上说,陕西重要作家文学的高度代表了当代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

建国路83号,中国文学历久弥新的地标!

□赵刚

大夏石马继承了中国汉代石刻艺术雄浑深沉、体魄巨大、生动传神的特点,代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水平,同时也是一件极为罕见的珍贵文物。

这是一匹1500多年前的石雕骏马,由整块花岗岩雕成。它驻足而立,昂首正视前方,静中带动,灵动感十足。

大夏石马远看高大威猛,近看呆萌可爱,侧面曲线流畅,身上有精美图案,马面刻有铠甲。仔细观察,它看似直立,其实在悄悄使劲抖动后腿,准备奔跑。因其常年伫立于户外,经过千百年风雨洗礼,身上伤痕累累——尾巴已断掉,耳朵不见踪影,胸部和铭文处都有残缺,但威风犹存。

根据《未央区志》所载,大夏石马为“大夏真兴六年(公元424年)刻。”原在汉城乡西查寨村外,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高2米、长2.25米,昂首端立,前腿并直,后腿微屈,造型古朴刚健。马的前腿扉壁雕有“大夏真兴六年岁在甲子夏五月辛酉”“大将军”等字。史载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大夏,为匈奴族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所建,首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白城子)。占据长安后,由其子赫连璜镇守。赫连璜兼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真兴六年被其弟所刺而亡,此石马可能是为纪念他而立。也可能因为赫连璜居于汉长安城宫内,而这种大型的石马应是其宫苑石刻之一。

“真兴”为赫连勃勃年号。陕西靖边县统万城遗址笔者曾去过几次,重要的一次是2016年国家邮政局发行《长城》邮票时,把统万城遗址搬上了第7枚邮票“高原北望”上。

“大将军”就是赫连璜。他当年就是骑着这匹战马,跟随其父攻下了长安城。此后,他又以太子身份任“大将军”并镇守长安。真兴六年,是赫连璜镇守长安的第6年,也许是为了纪念自己曾领军攻克长安的赫赫战功,抑或为了怀念陪伴自己征战南北的铁骑神骏,赫连璜令工匠雕刻了这匹石马,且在石马上镌刻下雕造年月和自己的官职姓名。石马雕成后,置于赫连璜的驻守之地——汉长安城的长乐宫前,时称“汉城石马”,直至大夏灭亡。朝代更迭,此石马始终不曾挪移。

大夏即为大夏国,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国家,拥有陕西北部 and 内蒙部分地区。赫连勃勃于公元407年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境内建统万城为都,耗时6年,寓“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统万城是中国历史上在沙漠中建造、匈奴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

接着,赫连勃勃于十年后的公元417

年统率大军一举攻占长安。这件大夏石马成了大夏国铁骑神骏征战南北的纪念,成为唯一有文字刻载文物。

大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仅存在了24年(公元407年—公元431年),留存至今的遗物寥寥晨星。这件刻有大夏国年号极为珍罕的石马,是迄今发现的大夏王朝唯一有文字纪年的遗物,其价值不言而喻。

大夏石马是从汉城遗址的一块麦田上发现的,发现人是著名美术史学家王子云、考古学家何正璜夫妇。

何正璜的考古游记中撰文记述:1954年初夏,和西北历史博物馆同仁前往西安汉长安城遗址考察时,在一片麦田中看到一匹石马。众人原本以为是汉代石马,当他们拭去尘土,惊喜地读到“真兴六年”等字样时,确定了它是1500多年前大夏国的遗物。这一次考察促成了伫立千年的大夏石马移步西安碑林。

石刻马造型艺术非常明显地继承了秦汉以来的表现手法,从大处着眼,循石造型使其神态毕肖,生动异常。充分地运

大夏石马

用线刻、浮雕和圆雕相结合的处理手法,整个雕塑以圆雕的形式出现,但在表面做了大量的线刻以及浅浮雕处理,既保持了雕塑的厚重感和饱满感,又具有一定的绘画效果和装饰效果。

王子云曾记述这件石马:“造型质朴、古拙,与西汉霍去病墓的几件石马,特别是‘马踏匈奴’所表现的遒劲刚健的风格颇为接近。由于马腹下有一个空隙,雕刻者为了保持四腿的坚固,所以前后腿雕成两个屏壁。这种巧妙的安排,在当时说来,是很进步的。”这段对大夏石马艺术价值的评价,足以说明它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值得说明的是,1954年初夏时,汉长安城遗址还属于长安县第八区(三桥区)。查阅《未央区志·大事记》才发现,1954年初夏过后的9月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通知将长安县的第八区(三桥区)划归西安市,西安市第八、第十一区建置撤销,合并建立未央区。区政府设在自强东路。此时才是未央区诞生之日,但属于一小未央。因而“大夏石马”又成了未央区的

碎金驿的“金”

的禁令,允许党项人在宋朝沿边以青、白盐交换谷物。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党项拓跋部首领李德明请求宋廷在陕北等地与其部交界处设“榷场”,得到宋廷的允许后,在今上盐湾镇碎金驿村等地相继设置榷场,进行贸易交往,时常出现“商贩如织”的盛况。

“碎金”比喻精美简短的诗文。此二字很容易将人的思绪引入唐诗宋词。“一轮秋影转金波”“无定河边暮角声”,碎金驿因地处无定河东岸,斜阳洒映河畔,金波粼粼,岸边的砂砾在斜阳映照下亦如碎金遍地而得名吧。

无定河谷,秦汉时辟为从咸阳通往九原郡等地的驰道成为驿道,碎金驿应该是其中一个缩影。历史上秦公子扶苏、大将蒙恬,汉时“龙城飞将”李广、唐郭子仪、宋朝的沈括,都曾在这一带跃马横戈、运筹帷幄。据记载,宋淳化二年(992年),占据陕北西北地区与宋廷抗衡的党项拓跋部物资匮乏,首领李继迁请求宋廷解除陕北边禁,设立边市,得到宋廷的允许。党项人以“马、牛、驼、羊、毛褐(毛织品)之产”贸易,宋朝则以“金银、缯帛之货,互通有无,各得其所”。993年,宋廷又取消了对党项人所产之青、白盐入境

的禁令,允许党项人在宋朝沿边以青、白盐交换谷物。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党项拓跋部首领李德明请求宋廷在陕北等地与其部交界处设“榷场”,得到宋廷的允许后,在今上盐湾镇碎金驿村等地相继设置榷场,进行贸易交往,时常出现“商贩如织”的盛况。

碎金驿也是西口古驿站。我恍惚看到村路上运送货物的马帮、驮队和山坡、河畔上劳作的先民的脊梁与背影……

行走在碎金驿村人,一砖一瓦都透着亲切而温暖的气息,整洁的村庄环境,焕然一新的墙体立面跃然眼前。同行的陈涛老师还特意推开门一户人家院落,院内干净整洁,种满了花草,院落里门旁是水冲式厕所,枝藤绕墙。

“村子确实是越来越漂亮了。”身旁的村民说,一脸的喜悦。

村里这些变化得益于榆阳区整区推进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得益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更得益于乡村建设的提升,也无不可以看到乡村建设的提升。碎金驿就是一部精美简短的诗篇。

□王树强

沙苑芝麻

香醇无疑为这些美食增添了一抹不可复制的风味。而在我国,芝麻更是一种深植于日常的美味。从芝麻糊到各种凉(热)拌菜,芝麻的香气与营养滋养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然而芝麻的魅力远不止于此,近年来,科学家们通过研究,揭示了芝麻中蕴含的抗衰老成分,让人们重新审视芝麻的健康价值。

沙苑地区种植芝麻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汉代。

早在古代,人们就认识到沙苑地区的自然条件对于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据《史记》《汉书》等古典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此地便开始了大规模农田开发,种植包括芝麻在内的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到了唐代,沙苑的农业经济进一步繁荣,芝麻作为重要油料作物,已经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宋代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增长,沙苑地区的芝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品种也得到了改良和发展。明代嘉靖年间编撰的《大荔县志》中就有详细记载,说明当时沙苑芝麻已经成为地方特色产品,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明清两代,沙苑芝麻种植和贸易到了鼎盛时期。不仅供应本省需求,还远销周边省份甚至更远的地方。尤其在清代,沙苑芝麻因品质上乘,曾作为贡品进献给宫廷,由此可以看出其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沙苑地区种植芝麻的历史是一部厚重的农耕文明史,见证了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

今天,沙苑芝麻不仅是大荔县一张农业名片,也成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力量。

□秦川



大夏石马。

